



〔俄罗斯〕

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编撰

世界文学史

第一卷·上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014061231

I109

111

V1-1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俄罗斯〕

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编撰

世界文学史

第一卷·上册



I109

111

V1-1

上海文艺出版社



北航

C1748341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м. А. М. ГОРЬКОГО

ИСТОРИЯ ВСЕМИ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ТОМ ПЕРВЫЙ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 ТОМА
И. С. БРАГИНСКИ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Н. И. БАЛАШОВ, М. Л. ГАСПАРОВ,
П. А. ГРИНЦЕР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3

《世界文学史》中文版翻译委员会

总 主 编：刘魁立 吴元迈

第一卷校订：伊 伟

第一卷译者：陈雪莲 何长有 李新梅 浦子毅
沈培伦 施国安 童炜钢 张湘湘
赵艳秋

《世界文学史》中文版编辑出版组

统 筹：陈 征 郑宗培 曹元勇

责任编辑：赵南荣 徐华龙 吕 晨 胡远行
余雪霁 林雅琳 肖海鸥 胡艳秋

装帧设计：王志伟

校对统筹：林莉敏 何行亮

印制统筹：居致琪 周剑明 陈 森

出版说明

俄文版《世界文学史》是1980年代分卷陆续出版的一部大型基础性学术著作，由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主持，联合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外国文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历经数十年编纂而成。

199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翻译出版《世界文学史》，得到了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版权许可。此后的十余年间，本社组织了翻译力量，起草了翻译体例，经过众多俄文专家和出版社编辑组的艰苦努力，八卷本（十六册）的中译本《世界文学史》现在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在中译本《世界文学史》出版之际，有必要对翻译、编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作一些说明。

1. 俄文版《世界文学史》原计划出版九卷本，计划中第九卷叙述的年限是1917年至1950年代。最后正式出版的是前八卷，第九卷只是个“征求意见本”。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建议中文版翻译出版前八卷，第九卷暂缓翻译出版。其理由是，第九卷尚不成熟，需要重新撰写。因此，现在出版的中译本《世界文学史》是八卷本（十六册）。

2. 俄文版《世界文学史》是苏联时期出版的著作，其历史观和文学史观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印记。中译本为了保持这部基础性学术著作的完整性和历史面貌，按原文译出，未加删节和改动。

3. 《世界文学史》全面阐述了世界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涉及的人名、地名、作品名的翻译十分复杂，尤其是各民族文字先译成俄文，再译成中文，加上各民族语言发音不同，转译过程中稍有疏忽，就会出错。中译本《世界文学史》在编辑过程中，尽可能参考各种工具书，采用中文标准译法，统一和校正了全书的人名、地名、作品名，但难免会有错译和漏校，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4. 为尊重原文的表述，完整呈现俄文版《世界文学史》的原貌，中译本《世界文学史》中论及的某些文学概念与范畴，与中国读者通常的理解

有所区别，例如对于“散文”的定义（可指“诗歌”以外的所有体裁）等等，阅读时需加以判别。

5. 俄文版《世界文学史》每卷附录中都有“参考书目”，收录了本卷叙述的文学史时限内世界各民族有代表性的著述和文学作品以及后世的相关研究著作的目录，对外国文学研究者颇有参考价值。中译本将俄文“参考书目”直接附录于每卷之后。

6. 俄文版《世界文学史》每卷附录中都有“人名索引”，中译本按照翻译著作的惯例，保留了人名的俄文版索引页码，并在全书的边页标出了俄文原著页码。同时，中译本《世界文学史》的“人名索引”按照汉语拼音重新排序，便于读者使用。

中译本《世界文学史》出版项目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和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资助，我们在此表示感谢。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年12月

目 录

全书引言	1
本卷编者的话	11
本卷总序	13
1. 第一卷在《世界文学史》中的地位	13
2. 第一卷的性质和问题范围	23
3. 语言艺术的产生和早期形式	26
第一编 亚洲和非洲的最古老的文学	73
本编序言	73
第一章 古代埃及文学	75
1. 古王国的文学(前 3000 年)	80
2. 中王国的文学(前二十二世纪至前十六世纪)	91
3. 新王国的文学(前十六世纪至前八世纪)	103
4. 通俗文学(前八世纪至前三世纪)	111
5. 戏剧	115
第二章 古代两河流域文学	117
1. 苏美尔文学	119
2. 阿卡德(巴比伦—亚述)文学	145
第三章 赫梯和胡里特文学	177
1. 胡里特史诗的赫梯译本	179
2. 涅萨的古赫梯文学(前十八世纪)	183
3. 哈梯文学	186

4. 古赫梯王国的文学(前十七世纪至前十六世纪)	188
5. 中赫梯文学文献	191
6. 新赫梯文学(前十四世纪至前十三世纪)	193
第四章 乌加里特—腓尼基文学	197
本编结语	209
 第二编 古代世界的古典文学	213
本编序言	213
 亚洲文学	219
第一章 中国古代文学	219
1. 上古阶段	219
2. 古典阶段	234
3. 晚古阶段	281
第二章 古代印度文学	302
1. 古代印度文学的起源	306
2. 吠陀文学	309
3. 公元前一千纪下半叶的文学	342
第三章 古代伊朗文学	379
1. 《伽泰》	380
2. 《阿维斯陀》的其他篇章	399
第四章 古希伯来文学	414
1. 古希伯来文学的历史前提	417
2. 古希伯来文学的世界观基础	419
3. 语言艺术的前文学形态	423
4. 编年—纪事作品	426
5. 先知文学	436
6. 抒情文学	441
7. “智慧”文学:规范训诫及对它的反抗	450
8. 启示文学	468
 欧洲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学	473
引言	473
第一章 古代希腊文学	487
1. 古希腊文化的源头	487

2. 荷马史诗	493
3. 后荷马时期史诗	512
4. 训海史诗	514
5. 抒情诗歌	519
第二章 古典时期(前五世纪至前四世纪)的希腊文学 诗歌	537
1. 雅典的城邦国家(公元前五世纪至前四世纪)	537
2. 悲剧的起源和戏剧演出组织	541
3. 埃斯库罗斯	546
4. 索福克勒斯	555
5. 欧里庇得斯	565
6. 古代阿提喀喜剧	578
7. 阿里斯托芬	580
8. 中期阿提喀喜剧	588
第三章 古典时期(前五世纪至前四世纪)的希腊文学 散文	589
1. 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五世纪的伊奥尼亚散文	589
2. 公元前五世纪的阿提喀散文	595
3. 公元前四世纪的阿提喀散文	604
第四章 公元前三世纪至前二世纪的希腊化文学	616
1. 时代与文化	616
2. 公元前四世纪希腊文学的希腊化准备	626
3. 公元前三世纪上半叶的希腊化文学	633
4. 公元前三世纪下半叶至前二世纪的希腊化文学	651
第五章 公元前三世纪至前二世纪的罗马文学	656
1. 早期罗马文学发展阶段	656
2. 罗马文学中各种体裁的形成	669
第六章 公元前一世纪的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	677
1. 时代与文化	677
2. 国内战争时期的文学	686
3. 帝国建立时期的文学	703
第七章 公元一世纪的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	726
1. 时代与文化	726
2. 从古典主义到“新风格”	730
3. “新风格”统治时期	735
4. 回归古典主义时期	744

第八章 公元二世纪至三世纪的希腊和罗马文学	754
1. 时代与文化	754
2. 第二智者派及其先驱	760
3. 第二智者派 体裁与代表者	768
4. 公元三世纪的危机和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终结	779
第九章 早期基督教文学的起源和发展	781
新纪元起始时期的世界文学	803
结束语	825
人名索引	831
参考书目	847
中文版编后记	897

全书引言

奉献给读者的九卷本《世界文学史》^①的使命是评述从上古时代——文学产生之时起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止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历史运动，并阐明这一运动的主导规律性。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中这是第一部如此广泛地包罗综合其材料的著作。编著这样的著作的必要性是很明显的。这种必要性是由我们的文艺学学科发展的自身逻辑所决定的。最近一个时期各民族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地理界线和历史界线被研究者明显地扩展了。同时，探索对现有十分丰富的文学史材料进行总结的途径的兴趣变得越来越浓厚了。足以证明这一点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是苏联科学在探讨世界文学过程的比较研究法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世界文学史》的问世是符合我们时代的迫切社会需求的。这部力求阐明世界文学发展历史规律的学术巨著的依据，是确信文学过程和社会生活进程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有机的联系。《世界文学史》的基础是源出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说的历史一元论思想。这种思想充分注意到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形式之一的艺术创作的特点，同时认为社会发展和艺术发展是统一的。在这方面本书与唯心主义文学史观是对立的。唯心主义文学史观的最重大特征之一是不相信存在客观的历史规律性，因而对撰述规模宏大的综合性文学史著作失去了兴趣，并多半不再能撰述出这样的著作。在这方面还应该强调一个对《世界文学史》来说极为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在选择和评价文学史材料时不能抱如下的成见，即低估所谓“小”文学的历史重要性，认为个别区域的文学起“超群的”作用，由此而产生对其他地区文学艺术成就的轻视，表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或者相反，表现出东方中心主义的倾向。在这方面，从观点的客观性及其在本书结构中的反映来

① 俄文版《世界文学史》最终只出版了八卷，第九卷未正式出版。本书脚注除作特别标明外，均为原书注解。——编注

看,《世界文学史》不同于国外出版的许多同类著作。

- 《世界文学史》之产生(也不能不产生)是要总结苏联文艺学积累的经验,苏联文艺学在研究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史方面和理论领域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包括探讨对人类艺术演变进行比较研究的若干原则。我们的学科最近一个时期在认识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和文学史问题,如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演变的规律性(世界艺术文化发展中最重要原理)方面取得的极为重要的成果;对“方法”和“风格”或运用于文学史的“进步”概念等范畴所作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更准确地确定系统分析的原则等许多方面——《世界文学史》的编写只能在包括它依据上述这些在内的那种程度上才能够顺利进行。同时,编写《世界文学史》一事本身推动了比较文艺学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加速研究。在这方面只要提一提如下问题就够了: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类型学方法在文艺学中的作用,西方和东方艺术文化发展的比较分析,世界文学发展过程统一原则的内容,这一原则与另一个基本规律——历史发展的不平衡——的相互作用的性质。《世界文学史》的编写使得研究上面列举的问题的兴趣变得浓厚了,同时这种研究的各种成果也丰富了编写工作。

《世界文学史》是大批学者的工作成果。除了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全体科学研究人员,参加该书编写工作的还有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苏联科学院斯拉夫学和巴尔干学研究所的科学研究人员,苏联科学院及其各分院的其他研究所、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国立全苏外国文学图书馆的研究人员,高等学校的教师等许多其他的专家。

准备编写《世界文学史》这样篇幅浩瀚和复杂的巨著花费了不少时间,经历了各个不同的阶段(包括科学界广泛讨论本书各卷的纲要和样本),采取了全苏规模的专门科学措施,这些措施有助于更准确地阐明作为本书基础的理论原则和文学史原则。列举所有这些阶段和措施是不必要的,不过,我们有责任在这里向参加书面评论和口头讨论《世界文学史》各卷先行准备材料的、以及直接参与各卷组织工作的所有科学组织和学者个人表示深深的谢意。

与此同时还必须怀着感激之情指出那些对编著《世界文学史》全书的领导工作作出了特别重大贡献而现在已去世的学者的名字。他们之中首先是伊凡·伊凡诺维奇·阿尼西莫夫,他在任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时发起编写这部科学巨著。还有尼古拉·约西福维奇·康拉德,他的深刻思想促进了我国科学界对世界文学过程的比较研究的发展,深化了并且继续深化着现在陆续问世的本书各卷的内容。还有鲍里斯·列昂季耶

维奇·苏齐科夫,他多年来和尼·约·康拉德院士一起分担本书主编的职务。还有罗曼·米哈伊洛维奇·萨马林,他是世界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部主任,为奠定《世界文学史》的基础也做了不少工作。还有伊里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涅乌波科耶娃,她从编写《世界文学史》一开始就主管世界文学研究所相应的处(后来改为部),直到1977年逝世为止她一直肩负着在科学和组织上直接领导编写这部结构极其复杂的创新之作的主要重担。伊·格·涅乌波科耶娃在制定对各民族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理论原则方面也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世界文学史》的编著者在确定已构想好的研究著作的轮廓时必须解决不少复杂的任务。他们面临的首要理论问题之一是定义已着手编写的著作的“成分”。这个问题与阐明“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本身的内涵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下的著名定义中,“世界文学”这一术语是用来说明世界文学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合乎规律的阶段的,这个阶段之产生是资本主义关系发展完成阶段所引起的深刻社会变化的客观结果。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他们那个时代的现实,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同时,“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并不限于这个具体的历史和地方性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简略勾画出的这个变迁是由先前全部的世界文学史已经作了准备的;它是先前世界文学史的独特总结,如前所说,是合乎规律的总结。因此也可以从更广泛的方面来谈“世界文学”,就是说认为“世界文学”是从上古时代起到我们这个时代为止世界所有民族文学的总和。同时,这里所说的总和不是简单的机械的总数,而是要研究它各部分的内部对比和相互联系、研究这些对比和相互关系的不断变化,以便揭示决定这些变化、这一运动的实质和意义的基本规律性,这一运动最终将导致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质的飞跃。 · 7

然而,还有另一种关于世界文学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世界文学”的概念只包括人类艺术文化中具有永恒世界意义的最巨大成就。这种观点在西方学科中得到了特别广泛的传播,它把世界文学史说成是一种“包罗万象的”、“超民族的”、从文学发展的民族形式的具体分析中抽象出来的现象,从而具有十分鲜明的政治色彩。按照这种观点,“世界文学的整体是被阉割的、没有民族特色的‘整体’”(伊·格·涅乌波科耶娃的说法)。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立场来看,这种观点是不能接受的。

现在出版的《世界文学史》是建立在另外一些原理基础上的。如果说把

世界文学史理解为各民族文学的简单的、机械的总和显然是不能接受的,那么力求尽量广泛地包罗世界各民族文学在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整个发展史上的贡献,就具有原则性的、理论的和方法论的意义(当然,要考虑到,究竟什么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它的成分究竟是什么,因为“文学”这一概念在各个世纪的进程中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看来只有实现这一任务(这也是《世界文学史》的任务),才能为探索世界文学过程的客观规律性创造最佳的可能性。所谓“小”文学有时能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艺术珍品,能成为此类全面概括的基础,如果没有这种全面的概括,我们关于世界文学过程的概念就会存在严重的缺陷。最后,应该强调,这样的写法有助于克服无论欧洲中心主义或东方中心主义都具有的片面性和科学上极为有害的极端化。

在奉献给读者的这一著作中,东方和西方文学发展途径的对比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解决这个复杂的历史类型学任务时,《世界文学史》的作者和编辑们一方面竭力避免简单地缩小东方和西方的差异,避免机械地把它们归结为通常由西欧文化中通行的标准所决定的一种类型,另一方面,也要竭力避免另一种同样先入为主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西方和东方仿佛自古以来就是互相排斥的,因此在东方一切都必定是和西方不同的,首先必定是比西方更古老的。集体创作的这部著作的参加者在对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中的相似现象进行对比时,在阐明存在于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和类型关系时,同样也分析了许多世纪进程中形成的、处处都决定文学发展的那些规律性的特点。例如,十九世纪以前引人注目的是东方文化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东方文化中传统因素的作用较稳固,东方文化的特点往往是与城市文明有联系的进步倾向的兴起和衰落的不断交替,此特点具有重大的意义。显然,它有某些内在的和外部的原因(例如,蒙古人、鞑靼人、土耳其人的入侵造成了毁灭性和灾难性的后果——在东方和东欧各地区的广大土地上彻底消灭了高度文明的富有成果的发源地,打断了它的自然前进运动)。整个说来,东方固有的特点是中世纪文化很强的延续性和丰富性,它那里的中世纪文化能兼收并蓄各种极不相同的倾向而自己不会遭到重大的破坏。同时,尽管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发展各有其特点,但如果从按类型概括的角度来分析,它们都是分阶段朝着共同的方向从古代经过中世纪发展到新时代的。

与世界文学史的“成分”问题有联系,并同样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另一个问题是:个别民族文学的事实在这部历史中应该占有多大的分量?有一种理论认为,“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内容与人类文化中某个“最有价值的部分”的概念是意义相同的,我们原则上应该摒弃这一理论,但同时又必须

注意到这种理论的合理内核。显然,“世界文学”是一个既具有同时幅度也具有历时幅度的概念。它不仅指某个具有其一切内在关系的特定时代的各地区文学,而且是指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力量,因而仍是文学发展的积极力量的以往一切文学传统的总和。过去的伟大作家们对世界文化宝库的贡献的基本轮廓在本书中以直接论述他们创作的述评来表现。然后再由编写者在论述该作家所产生影响的最重要表现的各编中具体分析这种贡献的各个方面。

同时——应该再次强调这种情况——《世界文学史》不限于分析那些具有世界艺术意义、或者至少具有广泛的民族间艺术意义的创作成就。因为在这部集体创作的著作中,基本的研究单位主要是具有自己的完整性和内在辩证法的民族文学史——从它产生的阶段起(在形成现代民族的时期之前是各部族创作的文学的历史),所以注意和评述的对象(尽管从全面性的观点来看,这些证述是各式各样的,从简略地提及到专门的概述)应该是对祖国文学发展作出了明显贡献的任何作家。

不过,基本的研究单位问题的解决对于本书总体上的意义不是同等的。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也有某些偏离,这是文学过程个别阶段的特点决定的,首先是由体现世界文学发展统一性规律的那些形式的特点决定的。在某些阶段上各个地区文学发展的相似类型促使本书编写者不是把民族特征而是把形成结构的其他范畴,如文学体裁(在较早阶段)或流派(在现代)作为对材料进行概括和分类的基础。

比如说,中世纪是这方面的例外之一。本书第二卷分析西欧文学的那一编的结构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子。在这里起主导作用的轮流是分析中世纪文学各种体裁和“层次”的章节:拉丁文文学、古代类型的民间史诗文学、英雄史诗、宫廷骑士抒情诗、骑士小说、城市讽刺文学和训海文学等等。对这些极不相同的体裁的各种民族形式的评述在这一编的结构中只起次要作用。自然,这一编的这种结构不是任意决定的,而是由中世纪社会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特点决定的,而这些特点,一方面正是整个文学过程尚未充分分化出民族的、社会的、个人的方面,另一方面,是中世纪文化特有的包罗万象的趋向、当时艺术世界观中所表现出来的类型化、各种直接的文学联系比较有限等等。

而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基本的结构单位是各民族文学的历史(如前所说,这些章节占主要地位),在这些章节中组织材料的原则既适用于西方地区,也适用于东方地区。

上面简要说明的处理世界文学比较史结构的方法并不是公认的。例如,在当代西欧文艺学中盛行这样一种倾向,即把个别艺术作品作为文学

比较史的基本结构单位来分析。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著作：对新时代（而不是具有历史特点的中世纪）各主要文学的状况所作的分析服从于对某些体裁的分析。最后，还有这样的著作：试图把艺术风格或流派类型作为世界文学的基础。

试图在刚才提到的理论基础上建造整个《世界文学史》大厦，是片面的，因为这种写法把文学演变过程割裂开来，使它失去了统一的图景，并使它脱离了与它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基础。只有努力再现完整的民族文学演变过程，才能揭示这一过程中由相互矛盾的倾向的斗争决定的内在辩证法，才能阐明艺术发展与国家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在深刻联系。

9. 阐述各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性及其特点是我们这部多卷本著作的基本任务之一。同时，在充分注意民族文学演变过程的完整性及其内部辩证法关系的情况下，在世界文学史的框架内对该过程进行分析是具有自身特点的，需要有特殊的视角。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孤立的、就其内部关系来研究这些民族文学。不仅要在它们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而且要在世界艺术文化演变的共同联系中来研究这些民族文学。“历史联系”这一概念在这里是关键。任务在于要把揭示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确定这些民族文学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在作为一种宏观体系的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进程中所占的地位结合起来。只有顺利地运用这种方法才能解决本书的重大任务，诸如揭示俄罗斯文学的世界意义。要做到这一点主要不是用数量的方法，不是借助于积累那些能证明某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对外国文学家影响的各种例子，而首先依靠的是客观分析俄罗斯文学产生的精神珍品，阐明决定这些珍品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所具有主导意义的历史原因。

包括个别民族文学的评述在内的对比、排列、检视，在这里不仅具有同时性的一面，而且具有历时性的一面。其原因就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历史联系”这一概念不仅是指某一种民族文学当时的“文学环境”状况，还可以包括与其他民族文学过去的现象相同的现象，或者相反，与尚未产生的未来现象相同的现象。

用比较的方法阐明各民族文学历史的这个任务在《世界文学史》中是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实现的。各民族文学是作为更广大地区和文化历史综合体（地带、区域）的文化遗产的一个成分予以研究的，而另一方面，是从各民族文学折射出共同的美学倾向、并体现共同的美学形式（方法、风格、流派、体裁等）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的。这里地带或区域的概念是一个类型更宽泛的构成物，而不是指某种僵死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相反，地带或区域是经

受历史变动的活动的概念。地带或区域的成分,地带或区域内部各民族文学在主导作用、吸引力或发展速度方面的对比,促进该地带或区域形成和得以保持的诸因素的作用本身,都可能发生变化。

在《世界文学史》中十分重视各民族文学相互关系的研究,重视它们之间的所谓接触联系和渊源关系,重视确定与某一文学时代相应的这些联系的水平、方式和倾向。例如,关于某一时代文化中心转移以及文学影响发展的基本方向的概念,在许多方面既决定了论述某区域各民族文学的那几编的结构(就材料排列的次序而言),也决定了全书某几卷的结构。

《世界文学史》第一卷的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各民族、国家和大陆之间的文化联系和文学联系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而不管保留到现在的这些联系的痕迹怎样残缺不全。这种情况具有重大意义。它再次证明,把“世界文学”这一术语理解为一种处于不断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整体,把它扩展到自产生之时起的全部人类文学史,是合理的。

然而,对于论证这一类理论观点具有更大意义的是类型的对比。文学影响与类型的相似和对比是两个概念,同时是互相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在苏联的文艺学学科中是公认的事实。其实,A. H. 维谢洛夫斯基早就认识到并强调过这一事实的意义。但历史类型学方法在文学的比较研究中还是占有特殊的地位。这种方法开辟的前景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优胜于继承了实证论的全部片面性和狭隘性的两方比较语言学的基本根源之一。正是这种方法使我们的文艺学能克服所谓“文学通史”和“文学比较史”之间的人为划分,而西方的比较语言学却认为这种人为的划分具有真正二律背反的性质。

• 10

探索充分说明全部世界文学演变的规律性,必须依据各民族文学发展途径的对比,或者如前所说,在较早的阶段,要依据各部族创造的文学的发展途径的对比。只有存在内在联系的诸现象才能加以对比。完全不同的现象是不能对比的。恩格斯有一个著名的定义:“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注意到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个别领域演变的全部相对独立性,并认为认识这一现象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同时认为,社会性质相似的社会发展阶段会产生许多方面相似的艺术想象类型。世界文学史上这一规律性的表现归根到底是由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进程的统一性决定的,在我们的学科中通常用“相同的历史类型”或“相似的历史类型”这一术语来表示。

同时,分析这种相同和相似之处除了确定相同的特征外,自然,还指确